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 《文学评论》

## 六十年纪念文选

60

(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

# 《文学评论》

---

## 六十年纪念文选

---

60

(第一卷)

---

# 文学研究所的第三个“六十年”

刘跃进

这几年，文学研究所相继迎来三个“六十年”纪念日，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2013年，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为此，我们主持编辑五部纪念文集：一是访谈录《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二是资料集《文学研究所所志》，三是《告别一个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四是演讲集《翰苑易知录》，五是在所庆五十周年纪念集《岁月熔金》基础上形成的《岁月熔金二编》。在《岁月熔金二编》序言中，我试图梳理文学研究所的传统，认为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研究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研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都必须遵循的准则。正是在这种精神引领下，文学研究所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一，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示范作用，这是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其二，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其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其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遵循“双创”原则，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来做。

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我们又编辑了两部著作：一是《〈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二是《〈文学遗产〉六十年纪事初编》。在《〈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序言中，我着重阐发了

《文学遗产》创刊以来在三个方面的重要推进：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陈出新，加强对传统文献学、中国文体学，尤其是对文学经典的研究；二是拓展时空维度，海纳百川，将华夏各民族文学纳入中华文学研究的大视野；三是强化综合比较研究，旁罗参证，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体文化以及性别文化等不同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引进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将古今文学与中外文学联系起来，将文学艺术与相关学科贯通起来。

2017年，我们又迎来文学研究所的第三个“六十年”，即《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我们一如既往，组织编选三部纪念文集：一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从已刊发的六千多篇文章中，选录一百余篇，按照文艺理论、比较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五大板块编排，虽不免挂一漏万，但总体上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六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风貌。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历史原貌，除个别地方略作技术调整外，文字表述一仍其旧；二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汇》，收录七十多位作者的回忆性文章，记录作者与《文学评论》的渊源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风云际会；三是《〈文学评论〉六十年总目及编后记》，虽为资料汇编，存而不论，但从中依然可以读出很多有趣的信息。王保生先生的《〈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对这些信息多有解读。为此，我们征得作者同意，这次一并列入纪念文丛，希望为学术界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资料。

在组织编辑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系统地阅读这些文献，收获良多，感慨也很多。就其荦荦大端者而言，我认为，《文学评论》至少有三个重要特色值得关注。

六十年来，密切关注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文学评论》最鲜明的思想品格。《文学评论》的前身是《文学研究》季刊，创刊于1957年。何其芳同志在创刊号《编后记》中强调，《文学研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结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文学研究》非常注重专业性和前沿性：一是研究队伍，是专业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二是研究对象，是“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三是研究途径，是“持久而辛勤的

研究”。

随着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临近，1958年《文学研究》第4期《编后记》中指出：“要求全国的作者从各个方面来总结我国这伟大的10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为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现实性、战斗性，翌年将《文学研究》更名为《文学评论》，用大部分篇幅刊载对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评论文章。即便是古代文学研究，重点讨论的也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以及古为今用等亟待回答的重要现实问题。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依然坚持面向当代的办刊方针。在《致读者》中明确提出：“《文学评论》当前时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制造的种种谬论，特别是‘文艺黑线专政’论。”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拨乱反正工作，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积极组织召开座谈会，讨论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刊登系列评论文章，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鸣锣开道，专辟“新书新作评价”“中篇小说笔谈”“关于当前文艺思潮的笔谈”等栏目。此后，又专辟“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新时期30年中国文学研究”“台港及海外学人园地”“世界华文文学”等栏目，拓展研究空间。还围绕着“两个崛起”“朦胧诗”“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写作”“网络文学”“莫言研究”等话题，组织专题文章，展开深入讨论，推进当代文学研究，总结中国文学经验。

六十年来，围绕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这是《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学术特色。1957年创刊号的《编后记》写道：“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类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创刊之初，《文学评论》结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围绕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型性格与典型人物、历史剧创作与理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以及诗歌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1961年，《文学评论》第3期刊发严家炎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把关注的重点全面引向当代文学创作领域。这场讨论，不仅仅限于研究者之间，创作者也参与其中，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2005年，刘纳发表《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

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又引发新一轮争论。可惜作者早已离世，不能亲自作答。在纪念柳青一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以及最近召开的“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话题一直是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可见，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创业史》本身，实际上牵涉创作者与研究者、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柳青坚持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美学研究，必须结合艺术创作实践才会有说服力，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意义。此后，由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话题逐渐引申到文学上的共鸣现象、山水诗和自然美的问题；又由历史剧创作引发关于历史与历史剧的论争。这些话题，时至今日依然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第1期刊发毛泽东与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同一期，还刊发王朝闻的《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引发学术界关于艺术规律、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讨论。《文学评论》持续关注，相继刊发陈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李衍柱《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等论文，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索。他们提出的一些论点，今天看来也许已不新鲜，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确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众声喧哗。《文学评论》为此专辟“外国文艺理论评介”“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笔谈”“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建设”等专栏，积极开展学术讨论。早在1962年，钱锺书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通感》（1962年第1期）一文，较早运用心理学方法，比较亚里士多德的《心灵论》与中国的《乐论》，比较唐宋诗词与西方古典诗歌中的通感现象。他指出，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人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通感”或“感觉移借”。这些理论的探讨，成为后来文学研究的理论先声。郑敏《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认为解构主义强调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这

种理论有其合理性的内涵，可以借此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并引发女权主义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义对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和表达。林兴宅《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较早地从方法论角度论述我国文艺研究、文艺批评的变革过程，认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有机整体观念。强调整体性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已是常识，而在当时，他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讨论文学问题，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备受瞩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就被介绍到中国，重点分析视觉艺术心理学问题。傅修延《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指出，以拼音文字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对于“图像”非常重视，甚至成为视觉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较而言，以形声文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听觉形象更加关注。看字听声，“闻声知情”，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明清小说中存在着的“草蛇灰线”的艺术手法，强调艺术结构要有“连”有“断”。这与西方艺术更专注于一以贯之的“连”有所不同。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从近现代的“演说”入手，着重讨论“演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别开生面。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当人们有意识地发现丑，表现丑，把丑当作美的时候，荒诞便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为一时的审美思潮。蒋孔阳《说丑》（《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一文指出，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美与丑，滑稽与崇高，这些曾经的老话题，在审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也是持续不断的讨论话题。黄浩的《文学失语症》（《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认为新小说患上了“运动性失语”，“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由此延伸，古代文论也面临着现代转化的难题。季羨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强调我们应当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为此，《文学评论》编辑

部在1997年第1期特设专栏，精心择选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引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学术讨论。

世纪之交，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格外关注。面对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文学研究所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项目，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同时，又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选录近十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文学评论》也积极跟进，组织“二十世纪文学回顾”“文学史学笔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美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等栏目，重新审视传统文学思想的价值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回答人们关切的问题。从这些学术活动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既要坚持“文以载道”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的文学立场和人文情怀。钱中文就坚持认为，过度强调文化研究的价值其实是泛化了“文学性”，取缔了文学自主研究和独立的学科价值，一味地关注文学外部研究，最终将导致文学的消亡。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场讨论才刚刚开始，今天学术界热衷讨论的生态美学、比较文化等论题，已向传统文艺学、当代文学批评等领域延伸，影响不可小觑。

六十年来，《文学评论》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学人，确保优秀稿件源源不断，这是《文学评论》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从《〈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所收文章可以看出，很多青年学者的处女作，就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我对该书七十多位作者略作统计：30年代出生的有8人，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各占15人；50年代出生的居多，有30人；70年代出生的5人。这五代人，是目前《文学评论》的主要作者。30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新中国成立前期培养起来的，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多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生，或者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届”大学生。而今，这些作者大多年过耳顺，陆陆续续退居二线。在纪念文章作者队伍中，“70后”虽然仅占很小比例，但他们正奋战在科研一线，已经成为《文学评论》的最重要的作者群体，代表着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未来。当然，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很多刊物都面临着潜伏的危机。《文学评论》能否承担起名刊的责任，能否不断激发思想的活跃，能否持续推动学术的进步，都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学者给予更多的



支持。

在历史的长河中，六十年只是短暂的瞬间，可能无足轻重，而在共和国的学术发展史上，文学所的六十年，《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的六十年却在其中占据着独特位置，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在感念前辈学者艰辛创业的同时，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在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鼓励下，勇于面对现实，积极迎接挑战，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

2017年8月8日写于京城爱吾庐



# 主编寄语



# 纪念《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

张 炯

今年是《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为了纪念，编辑部编选了该刊60年来发表过的论文选集，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同志要我和过去当过主编的同志都写篇前言。说起来，我与《文学评论》确实关系不浅。我既是它培养的作者之一，先后在《文学评论》发表过20多篇论文；我又是它的编者之一，曾在《文学评论》担任过编辑组长和副主编、主编，前后历10年之久，持续任编委达30多年。虽然我没有参加选集的编选工作，但跃进同志之邀，自然难以推托。

60年在我国历史上不过短短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已是漫长的岁月。《文学评论》从创刊至今的60年，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学术，包括文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研究既涵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还涵盖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评论、海外华人文学和文学家研究。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1956年才改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评论》本来叫《文学研究》，是季刊，1959年为了加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更多联系文学现实，所以才改了刊名，成为双月刊。

现在读者见到的这个选本，都是曾在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由于篇幅有限，每个作者只选一篇，还有些作者没有选到，这自然有遗珠之憾。从被选入的作者来看，已可以见出《文学评论》曾拥有的强大作者阵容。像郑振铎、郭绍虞、俞平伯、夏承焘、刘大杰、夏衍、钱钟书、杨绛、冯至、蔡仪、唐弢、卞之琳、何其芳、王朝闻、杨周翰、罗大冈、陈涌、程千帆、范存忠、罗念生、王瑶、王元化、刘绶松、朱寨等，在上世纪50年代都已或是学界耆宿，或是文坛名家。他们成为《文学评论》的作者是自然的。其中，大多还是《文学评论》的首届编委。至于钱谷融、侯敏泽、蒋孔阳、李泽厚、曹道衡、胡念贻、罗宗强、王运熙、吴承学、樊

骏、钱中文、严家炎、袁行霈、陆贵山等，也于上世纪50~60年代闻名于文学研究界。后来继起的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洪子诚、刘登翰、王元骧、钱理群、陈平原、葛晓音、陈思和、雷达、南帆、陈晓明、程光炜、丁帆、汪晖、赵园、杨义、刘跃进、党圣元、姚文放、赵宪章等则属至今仍然活跃于我国评论界的老年和中年学者，此外，还有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更多属于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群落。可以说，论文集的阵容代表了6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不同年龄不同知识结构的梯队，而所选论文所以分为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部分，也大体反映了每期的栏目。

《文学研究》创刊时便把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刊物。当时的主编何其芳先生写的首期《编后记》指出：“配合形势的那种时评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点要放在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上，这是《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刊物的定位决定了的。”《文学研究》之前，文学研究所出版过《文学研究集刊》共5册，主要发表的都是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我那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见到这种集刊和后来的《文学研究》，便很景仰。我是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在当年《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之后便去参加国家文科教材《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又下乡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间无缘于学术。1975年邓小平复出，派新的领导林修德、宋一平、刘仰峤等同志主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筹备恢复科研业务，决定将学部原来直属的学术刊物《新建设》改为新创办的《思想战线》，并让“文化大革命”初停刊的《文学评论》《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复刊。为了复刊，上级指定原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的何其芳同志负责重建编辑部，成立由他和我以及毛星、邓绍基、蔡葵等构成的编辑核心组，邓绍基兼任古代组组长，蔡葵兼任理论组组长，我兼任现代组组长。60年代初，毛星就是副主编，蔡葵是编辑部的老编辑，邓绍基和我则分别在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组做研究工作。编辑部原来的编辑还有王信、杨志杰、陈骏涛、杨世伟、彭韵倩等。当时我们开始组织稿件，其时，刊物的约稿信仍然提“本刊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却首次从何其芳的谈话中得知《文学评论》的取稿标准是，“文章应有新意，还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证充分，自圆其说”。他还叮咛我们说，《文学评论》的编辑应该像蜜蜂采

蜜那样，把全国文学研究界最好的学术成果编选到刊物来。我理解，这大概是其芳同志主编《文学评论》以来自己所掌握的编稿要旨，也体会复刊的《文学评论》仍然以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为主。没有想到，不多时，刊物刚编好一期目录，便刮起所谓反“右倾翻案风”。《思想战线》和《文学评论》都被“四人帮”一伙认定是“右倾翻案风”的代表，没有出刊便夭折了。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粉碎，中央决定从哲学社会科学部借调数十人去接编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我也被调去，曾任该刊的文化组临时负责人。直至1980年初才回到文学研究所，却没有回《文学评论》编辑部，被所领导陈荒煤同志分配去当代文学研究室，协助朱寨先生主持编写当代文学史。虽然1982年我即被添为《文学评论》编委，但80年代一直没有参加实际的编辑工作。直到1990年5月才又被调到《文学评论》担任副主编，协助当时的双主编马良春和侯敏泽工作。1991年马良春因病住医院，我被任命为副所长。不久他去世，我受命主持文学研究所的全面工作，仍兼《文学评论》副主编。1994年我被任命为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直到1999年退居二线，去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与我同时担任《文学评论》双主编的先后是侯敏泽和钱中文。实际编辑工作，他们比我做得多。我退居二线后即不再过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但还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之托，逐年审读过已出版的《文学评论》有6年之久。每年均对刊物编辑版面提出读后感和改进意见。因此，如果从1982年担任编委算起，到2005年辞去审读工作为止，我与《文学评论》的工作机缘竟有25年之久，而至今仍然持续担任编委。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上世纪80年代中西文化的大冲撞，也经历了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上世纪90年代的正本清源与国学热；还经历了新世纪我国文坛和学坛的空前繁荣与多元走向。我感到，尽管学术环境从50年代到新世纪已产生很大的变化，60年间由于学术与政治的纠缠，刊物不能不受到许多政治思想批判运动的冲击，《文学评论》的编者还是基本坚持了它作为学术研究刊物的初心，坚持了以发表长期研究成果为主的编辑方针，坚持了文章“应有新意，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证充分，自圆其说”的取稿标准，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问题上既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的学术风范。论文选集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刊物60年来编辑部工作人员和广大作者共同努力所达到的大体风貌。尽管有不少重要作者和重要论文限于

篇幅没有选人，不能无憾。

回想起来，我主持《文学评论》期间，自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深为愧疚，但我也始终不敢忘记何其芳同志的取稿标准和办刊要求，努力选用学术上有新见的稿子。即使老专家的稿子如无新见，也婉言退稿；年青作者的稿子有新见虽欠完善便请责任编辑尽量帮助作者去完善它，择优采用。我知道，培养年青作者也是《文学评论》创刊以来的一个重要方针。1999年《文学评论》还编辑出版了青年学者专号，刊载青年学者论文24篇，论文提要6篇。60年来，《文学评论》的新作者经过自己努力，后来大多成长为我国文坛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

《文学评论》至今被认为是全国性的权威学术刊物之一，应该说跟它历年发表过许多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分不开。其中既包括老专家的厚积薄发之作，也包括年青学人的观点新锐之作。其中，像茅盾的长达5万言的《关于历史与历史剧》，像何其芳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文章《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像蔡仪论述现实主义与典型问题的论文，像陈涌、唐弢论述鲁迅的专论，像钱钟书论述艺术思维中通感规律的短文，像樊骏的《认识老舍》的长论，都见解精到，论证充分，令人叹服。

《文学评论》还因为组织了系列学术问题的争鸣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推进了学术的进展。除了论历史剧发表过李希凡、朱寨、茅盾的不同见解的文章外，就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形象思维问题发表过王朝闻、陈涌、毛星、李泽厚等的文章；就《红楼梦》的评价发表过何其芳、蒋和森、邓绍基、刘世德等的文章；就山水诗发表过陈贻焮、朱光潜、陆侃如、廖仲安等的文章；就新诗的格律和形式问题发表过何其芳、卞之琳、王力、罗念生、金克木等的讨论文章；就文学的共鸣问题先后发表过柳鸣九、林庚、陈桑、袁行霈等人的文章；就《创业史》的评价发表过严家炎、柳青的文章。80年代就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也发表过赞成和批评的文章，90年代还就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发表过洪子诚、陈思和等的文章，就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发表季羨林、张少康、曹顺庆、蒋述卓诸学者的文章等。此外，更就一些专题召开了多次讨论会、座谈会，在刊物上发表笔谈或报道。让不同意见的文章展开争鸣和切磋，不仅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论题的深化，也有利于实事求是、相互平等研讨的学风的树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学坛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学

术热点也不断嬗替，其间曾经出现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纠缠，这些情况都必然会反映到报刊上来。《文学评论》虽然是学术研究刊物，应上级部门的要求，就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意见开展批评和批判，也难免。如上世纪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和所谓“右派”言论发表过批判文章，60年代在人性问题上发表过对巴人、王淑明等先生的观点的批判文章，90年代涉及自由化问题的批判文章等。自然，学界可能有不同意见，当时却无可规避。这类文章没有入选，我想，大抵还是坚持学术研究的定位的缘故。现在的选本，让读者大体能够看到我国文学研究界所走过的历史轨迹。作为《文学评论》的老编辑之一，面对这个选本，不免有亲切之感！不能不感谢编选者所付出的辛劳！同时也殷切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在新一代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刊物能够发表更多更好的文章。

2017年5月4日于杭州

# 《文学评论》已长成一棵大树

钱中文

《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了，就文学评论研究界来说，经历了一个花甲的刊物（不算报纸）大概独此一份。人到甲子，开始进入老年，《文学评论》则是刚刚进入它的盛年。

《文学评论》是共和国新文学成长、经受挫折、继而逐渐苏醒的见证，也是共和国文学走向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的见证。

谈到《文学评论》创刊前后的情况，我们也总会想起何其芳所长，他的独创的学术思想，他的优良的学风，他的学术民主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研究所的编辑人员与研究人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的引导下，《文学评论》终于迎来了新生。由于《文学评论》的地位特殊，那时不少刊物尚未复刊，于是时代给它提供了一个在文坛上独领风骚的机会，在短时期内，一期《文学评论》竟要刊印20余万份，同时还要应对不少读者的要求加码添印。《文学评论》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一时传为佳话！

《文学评论》及时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与评价，为扶持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造舆论，为新时期文学的创新与雄起，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不少后来著名的作家，从《文学评论》那里得到过切实的帮助与鼓励。《文学评论》刊出过不少高质量的作家评论；在文学理论方面，《文学评论》面对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与多样化，针对以往的教条主义的文论的症结所在，水到渠成，在各个时期适时地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文论观点，它们影响了创作界与文论界。《文学评论》对待花样众多的外国文学思想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与新世纪之初大举引入我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一直强调介入、鉴别、融通与吸收，显示了杂志自身的理论气度与魄力。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研究是我国文学研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群体，所以在



《文学评论》上佳作迭现，长期成为《文学评论》的亮丽风景线。

在 50 多年里，《文学评论》在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培养了几代高水平的作者，他们对《文学评论》怀有十分亲切的感情。参与这个纪念文集的同行，很多人已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研究家。同时在编辑中也有众多翘楚，薪火相传，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与辛劳，保证了《文学评论》的学术品格与领先地位。自然，《文学评论》也有自己的缺失，不同时期都出现过一些不注意导向的文章。

当今《文学评论》和整个国家一样，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伟大时代。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需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确立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这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思维模式，进一步深入解析与理解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与文论遗产的独创性与多样性，它的转型的传承性与参与新的理论建设的实践性，彰显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传统。

上世纪末，一位德国哲学家对一位中国学者预测说：在西方，原本发端于希腊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经枯萎，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他的预测：两百年内人们确是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与共享一切。这一预测虽然言中了，但可不是在 200 年内，而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是“现在进行时”了！局势的发展比思想与预测的变化更快！自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不是盲目的文化自负与理论自负，更不是权势迷恋的自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我们一面要开掘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同时也需要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入交流，进行比照，在差异、冲突与交往中发现新因素，创造新思想。一位外国诗人讲过，文学的交流不仅仅是互通有无，而且是具有更多的含义：一是用以激活自己，使自己获得复苏；二是为了使自己不朽，那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志趣了。在文化的共存与共荣中，现今世界上多种文化自然需要努力走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新境地。

几十年来，《文学评论》刊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引领过文学研究潮流。在庆祝它的 60 华诞之际，我衷心希望它能够不断地推出更多的佳构华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文学评论》已长成一棵大树！

2017 年 6 月 25 日